应收账款质押法律适用困境与解决路径

林丽

贵州财经大学法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摘要：《民法典》在《物权法》应收账款质押制度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但《物权法》针对应收账款质押制度的缺失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在理论上我国目前在应收账款质押方面的立法并不完善，导致实践中其在法律适用上的一些问题上，仍存在裁判不一的司法困境。应收账款范围不明确、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效力存在矛盾、应收账款质权实现受到阻碍的问题不仅增加了中小企业融资发展过程中多方当事人的法律风险，也破坏了司法实践中裁判路径的统一性，有损司法权威。应从规范应收账款的立法模式、明确项目收益权和未来应收账款关系的角度完善应收账款的范围；从确立登记对抗主义、建立统一的动产担保登记平台的角度完善应收账款质押的登记效力；从规定直接收取权、防范法律风险和完美相关主体的权利实现机制等方面确保应收账款质权的实现，构建系统的、完善的应收账款质押制度，促进中小企业融资积极有序地发展。

关键词：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效力；质权实现

DOI：10.69979/3029-2700.25.05.069

引言

在营商环境不断改善，经济活力持续迸发的背景下，中小企业的积极参与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容小觑。但在融资领域，大多中小企业因多种原因陷入了融资难的困境，生产资金的缺少严重阻碍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信用不足且缺乏合适的担保物，使其难以从信贷机构处得到融资。我国《物权法》规定的应收账款质押制度，在立法上为中小企业多渠道融资提供了法律支持，但是由于相关条款过于原则、抽象，对实际中的应收账款质押指导作用并不理想，随后《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的制定，为应收账款质押在实务层面上提供了可操作性，但部门规章在权威性上并不能让银行业就此安心，银行业为中小企业办理融资业务仍要担心为自身带来风险。《民法典》的正式出台似乎为应收账款质押的完善提供了契机，但并未对有关应收账款质押的法律条款做出实质性修改，体系上仍采用《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应收账款质押制度在适用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本文围绕应收账款质押在司法适用过程中的困境展开讨论，指出应收账款质押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存在应收账款的范围不明确、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效力存在矛盾、应收账款质权实现存在阻碍的困境，并针对此问题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促进应收账款质押法律适用的统一性。

2 应收账款质押的基础理论

2.1 应收账款的概念及类型

应收账款原本是会计学中的一个术语，其在会计领域专指企业的一种货币性资产，属于一种债权。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第2条中，

对应收账款的含义有较为详细的规定。根据《民法典》物权编第440条第6项的法律规定，应收账款可被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现有应收账款和未来应收账款。这一改动肯定了未来应收账款这一类型，扩大了应收账款的适用范围，是对应收账款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进一步鼓励中小企业采用应收账款方式进行融资。未来应收账款的可质押性为中小企业的资金融通以及风险承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市场运行机制，在债权的法律框架内将应收账款的类型进行扩充不仅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法律体系完善的必经之路。现有应收账款是指债务人履行其在交易项下的主要义务后，要求债务人付款的实际权利。未来应收账款是指转让合同或担保合同签订时尚不存在的应收账款。通说以发生债权为基础的法律关系存在与否为标准，将其划分为已有基础法律关系的未来应收账款以及尚无基础法律关系的未来应收账款。^[1]前者是指目前存在一种基本的法律关系，在添加了一定的事实后才会发生相应债权。^[2]后者也被称为狭义意义上的未来债权。对于这种应收账款，产生债权的基础关系还没有真实地存在，即基础合同还未订立，需要在未来的某一时间订立合同关系才产生的应收账款。也就是说，目前仅仅存在某种可能性，在未来债权的事实基础有可能产生并发展出债权。^[3]

由此可见，信用对于应收账款能否成功用于质押具有重大意义。未来债权处于现实债权产生之前的预备阶段，实质上又是对现实债权即期待性财产利益的另一种期待。^[4]

2.2 应收账款质押的价值分析

应收账款的可质押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企业资金流转缓慢、融资困难的现实困境。应收账款质押作为应收账款融资的主要形式之一,对经济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上市公司可在社会经济市场中获取多种融资通道,但对于非上市公司及中小企业而言,往往因无法提供抵押物、难以通过信用贷款获得流动资金等而陷入融资困难境地,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应收账款质押,变相达成未来资金的提前变现和回笼的效果,再将其投入到企业生产当中去,如此一来,作为商业信用的表现形式,应收账款不仅在初始交易中发挥了作用,还在以其为基础的融资中发挥了第二次作用,从被闲置的资产转化为一种资本形态。^[5]

3 应收账款质押法律适用困境

尽管未来应收账款可作质押这一改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但在立法上,应收账款质押相关规定仍然宽泛模糊,导致应收账款质押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民法典》对应收账款的规定过于粗略,应收账款的范围模糊。其次,《民法典》与《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相关条文存在矛盾,应收账款质押的登记效力仍然存在争议。

3.1 应收账款的范围不明确

尽管《民法典》440条承认了未来应收账款的可质押性,扩充了应收账款的范围,但是并没有进一步确定应收账款范围的内涵和外延,立法上的概括和粗略性对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并不能产生实质性的作用,反而会导致司法机关在具体裁判过程中莫衷一是,依据不同的法律依据做出不同的裁判,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目前《民法典》只是将应收账款规定为权利质权的一种类型,对应收账款质权的客体范围的规定仍存在法律空白。立法者在对实践中新出现的权利始终持有谨慎的态度,对于应收账款质权客体范围的限制是从考虑交易安全的角度出发的,虽具有一定合理性,但立法与实践的不平衡性最终也会导致法律规定所存在的滞后性,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项目收益权能否纳入应收账款的范围还存在争议。项目收益权可以追溯到收费权,2017年,《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再次修改应收账款范围,不再使用收费权概念,取之项目收益权,收益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在民法权利体系中得到确认。创设收益权的一项重要原因是对抗来自行政干预的不确定性。^[6]

项目收益权能否作为应收账款的一部分始终存在着不同观点。《民法典》并未对此做出明确规定,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明确将项目收益权纳入了应收账款类型中,但在立法上仍需做出法律层级的明确规定。

3.2 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效力存在矛盾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重申了公示对担保物权效力的重要作用。对于应收账款质押的登记效力问题,《民法典》采用登记生效主义,《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则采用登记对抗主义。《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虽没有对登记对抗主义进行直接说明,但是根据整篇文本,《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没有要求登记机关对应收账款质押登记信息承担审查义务,对错误登记信息也不需承担赔偿责任。

实践中,应收账款质押主要是根据《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采用登记对抗主义形式,这与《民法典》规定的登记生效形式相背离。公示效力上的对立性导致在司法实践中,若存在相关应收账款质押纠纷,采用不同裁判依据将会导致不同裁判结果,不利于法治统一。有观点认为《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应遵循下位法不得对上位法产生立法上的冲突的原则,应对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效力做出相应的调整,与《民法典》保持一致性。也有观点认为登记对抗主义更能满足应收账款质押的实际需要。

从立法上看,《民法典》物权编规定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编规定应收账款让与。《民法典》将二者分别规定,且没有法律明确应收账款质押可以准用合同编债权让与的相关规定,造成二者在立法上的制度隔阂。在对公示的规定上,应收账款质押以登记作为生效要件,应收账款让与则无须公示,当事人间的合意即可产生债权让与的法律效果,虽然需要进行通知,但通知也并无公示功能,只是债权让与能够对债务人发生法律效力的形式要件。

4 应收账款质押完善路径

4.1 明确应收账款的范围

《民法典》并未对应收账款的范围进行规定,导致在实践适用过程中产生诸多不确定因素。有必要对应收账款的范围采用适用的方式进行规定,逐个列举不能满足应收账款客体范围多样性的客观现实,可以采用列举加兜底的立法形式对应收账款的范围进行一个初步的界定。同时在立法上,要厘清项目收益权与未来应收账款间的关系,将项目收益权纳入到应收账款的范围内。

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权利的种类呈现出多样化,若依旧选择逐一列举的立法模式对各项权利进行规制的话容易产生实操性难、有所遗漏的困境。可适当对应收账款客体的种类限制。根据目前最常见的两种立法模式,第一种是一般的立法模式,以《瑞士民法典》第899条为基础,鼓励具有经济价值的产权进入担保领域,对新的权利质形式持开放态度,并通过法律解释将其纳入物权法定的范畴。^[7]另一种立法模式是“列举式+开放式兜底条款”。针对应收账款,在建议将项目收益权纳

入应收账款范围的前提下,可以先列举项目收益权的具体类型,然后将封闭式担保条款修改为开放式,法律、行政法规不禁止的其他产权可以进行质押。根据我国立法习惯,列举加兜底的立法模式更符合我国实际需要。

项目收益权是收费权形成的纯粹经济利益层面的收益权。从权利上来看,项目收益权应当归于未来应收账款的行列,项目收益权的可质押性是顺应社会实际发展的需要,将其纳入应收账款的范围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虽然应收账款具有金钱债权属性而归于民法中的债权,但是其内涵是多元化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列举了应收账款的不同种类,扩大了应收账款的范围,这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具有重要意义。且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双方交易的一个透明度,确保交易安全。从经济利益获取的角度出发,项目收益权纳入应收账款范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虽然项目收益权在性质上属于未来应收账款,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这也为其纳入应收账款范围提供了理论基础,在立法上理应也有必要做出相应规定。虽然《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将部分具体项目收益权纳入应收账款范围,但由于《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是部门规章,其法律效力地位较低,不利于法律的统一适用,有必要从法律层面上对项目收益权与应收账款之间的关系做出规定。

4.2 完善应收账款质押的登记效力

应收账款质押采用登记生效主义虽然在维护交易安全上具有优势,但从法律统一性的角度出发,应收账款质押与让与应建立综合的、统一的担保登记平台。采用登记对抗主义有利于提升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的效率、符合声明登记制的要求,也有利于应收账款质押与让与之间的制度统一。单一性的担保物权采用登记生效主义更能发挥其有用性,但是对于应收账款质押,其适用主体主要是中小企业,灵活、便捷是重要的因素之一。若适用登记生效主义,对每一应收账款都进行细致化的实质性审查,不利于交易效率的提升,不利于中小企业融资的积极性,有违应收账款质押的立法初衷。

相较于登记生效主义,登记对抗主义更符合中小企业对交易效率的要求。登记对抗主义对交易安全与交易效率之间的关系做出了相应的均衡,同时兼顾了登记人、登记机关、第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应收账款质押与让与之间的差异性不利于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应收账款质押采用登记对抗主义更加有利于其功能的实现,针对应收账款让与的债权处分的特性使得其和登记生效主义不相符合,在这一背景下,采用登记对抗主义似乎更为

合适。因为登记对抗主义并不会对让与的法律效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同时,在应收账款质押与让与统一于登记对抗效力的前提下,存在多个应收账款质权或让与时,均已经登记的,按照登记时间的先后顺序来确定权利的实现顺序;存在未登记的情况的,办理登记的优于未办理登记的。

5 结论

应收账款质押兼具安全性与高效性逐渐成为中小企业融资路径的一个优先选择,对市场经济的活跃具有不可忽略的巨大作用。然而目前我国应收账款质押法律制度仍旧存在诸多的空白和矛盾,致使应收账款质权人的相关利益得不到及时的、切实性的保护和救济,这无疑对企业的融资积极性有所打击。应收账款质押制度实践适用的困难是相关立法上的不足呈现,不利于应收账款法律制度的有效运用。在缺少相关立法的基础上,司法机关针对应收账款质押时便显得手足无措,倾向于用类推的方式做出相应的判决,但是这一做法无异于在对法律的权威性进行挑战,急需在立法上对应收账款质押进行统一规范。本文针对实践中应收账款范围不明确、登记效力存在矛盾的问题,寻找立法层面的不足性,结合现有法律制度,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完善,提出应明确应收账款的范围、完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效力的建议。完善应收账款质押制度是实现应收账款质押的立法目的以及经济目的的必要路径。

参考文献

- [1]史尚宽:《债法总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12页。
- [2]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下》,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07页。
- [3]黄菁蓉:《PPP项目未来债权证券化的法律分析》,广州:暨南大学民商法学,2016年,第25页。
- [4]孙超:《应收账款融资的法律问题研究——以促进债权流转为中心》,济南:山东大学民商法学,2011年,第80页。
- [5]孙超:《应收账款融资的法律问题研究——以促进债权流转为中心》,济南:山东大学民商法学,2011年,第36页。
- [6]王乐兵:《“物权编”与“合同编”体系化视角下的应收账款质押制度重构》,载《法学家》2019年第3期,第97页。
- [7]高圣平:《担保物权司法解释起草中的重大争议问题》,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1期,第228页。